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主编 ◎ 达力扎布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

——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

◎ 奇文瑛 / 著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

MINGDAI WEISUO GUIFUREN YANJIU

——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

◎ 奇文瑛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奇文瑛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660 - 0056 - 9

I . ①明… II . ①奇… III . ①卫所制(明兵制)—研究—中国—明代 IV .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7146 号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

作 者 奇文瑛

责任编辑 常远岐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056 - 9

定 价 42.00 元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鍾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的相关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鍾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先生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该学科的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为核心，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

2 ||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

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收入的论著都是本中心二期建设期间的科研成果，将其奉献给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学者与我们建立学术联系，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共同为该学科的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委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所有支持和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7年10月16日

Contents

目录

序 论	(1)
--------------	-----

第一章 明朝前期的北方移民

第一节 元明鼎革之际滞留中原的蒙古、色目遗民	(11)
第二节 明初来降的故元官兵和山后移民	(13)
一、明初来降的故元官兵	(13)
二、山后移民	(17)
第三节 永乐、宣德时期来归的鞑靼、女真诸族	(19)
一、永乐、宣德时期来归的鞑靼诸族	(19)
二、永乐、宣德时期内迁的女真人	(20)
第四节 瓦剌统一前后的鞑靼、兀良哈和女真移民	(22)

第二章 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

第一节 安置政策的形成	(24)
第二节 编充军事卫所	(27)
一、以归附人就地建卫所	(28)
二、山后移民和故元滞留军户招集入卫	(31)
三、降附人充实卫所	(36)
第三节 故元官兵在卫所中的组织特点	(47)

第三章 永乐以降来归女真、鞑靼与军事卫所

第一节 自愿内迁的女真人	(53)
一、永乐年间对辽东边外的管辖	(53)
二、永乐和宣德年间自愿内迁的女真首领	(56)
第二节 自愿内迁的鞑靼、瓦刺及迤西各族人	(70)
一、故元残部归附	(71)
二、鞑靼归附	(71)
三、瓦刺、西域人归附	(73)
第三节 内迁女真、鞑靼与卫所的关系	(77)
一、卫所带俸的女真移民	(78)
二、鞑靼移民的安置	(95)
三、京师达官的管理特点	(109)

第四章 归附人身份差异及其地位变化

第一节 “达官”与“鞑靼”称谓的区别与联系	(116)
第二节 寄籍与军籍卫所达官的身份差异	(120)
一、寄籍达官	(121)
二、军籍达官	(130)
第三节 寄籍达官的本质特点及其变化	(139)
一、寄籍达官的本质特点	(139)
二、寄籍达官身份变化	(145)
第四节 军籍达官的沉浮	(158)
一、靖难、北征与故元官兵命运的转变	(159)
二、达官新贵阶层	(174)

第五章 达官的婚姻及其改名问题

第一节 达官的婚姻	(190)
一、三家达官婚姻实例	(190)
二、达官婚姻的阶段特点	(200)
第二节 改易姓名中的民族交融	(208)
一、达官改易姓名的时间历程	(210)
二、达官姓名汉化的方式	(215)
结 语	(231)
附录：明代北方民族内附大事编年	(237)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259)

序　　论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属于民族关系史范畴，是欲通过对明代北方移民杂居中原的史事及其民族演化的考察，充实从辽到清朝多民族杂居融合潮流中，明朝时段史事的不足。

民族关系史是在民族史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通过与周邻民族互动关系的考察，从更宏观的视野中把握民族的特质和文化特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兴起以来，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区域、民族区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在相互依存的特点不断被揭示出来，从而对深化民族史和中国史研究的作用，越来越为学界关注。

就民族史而言，宏观视角下的民族关系，在梳理古代民族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深度都获得瞩目的成果。但随着民族史研究继续深入，以民族中心地区（各民族主要分布或聚居地区）为主考察民族关系问题的不足也逐渐显现。以民族中心地区为对象，考察的是稳定状态下的民族及其关系问题。然而纵观历史，任何民族的生存环境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受战争、自然灾害、经济需求、政治发展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民族或部分群体的迁移流转，甚至民族本体的变化，都是历史常态。在动态变化中，民族不外聚居和杂居两种分布格局。聚居无需解释，杂居与聚居相对，是指散居在本族聚居区之外的地方，一般有迁入另一民族地区居住，或居于与外族的交错地带等状况。由于杂居群体远离本族聚居地区，因生存环境变化，或受外来影响程度不同，其与聚居地区的发展变化不仅不会完全相同，而且因处于多元文化影响中，还有易变的特点。王明珂“华夏边缘”理论^①，就是看到处于民族边缘（杂居）的群体，没有聚居区民族那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提出以族群交叉亦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6页。

即杂居地带族群的主观认同为据，考察族群的变异及其根源的方法。华夏边缘的理论方法，虽然目的是研究民族认同的变化，而在客观上也提升了杂居问题在民族史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明代归附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杂居问题值得关注，还在于民族分布中，杂居程度远过于聚居的情况，以现今我国民族分布看，“县一级区域里，除西藏和新疆外，找到一个纯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乡一级的区域里也不是常见的”^①。我国 56 个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故而民族杂居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学术的深入推进，还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认识，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由于自然、政治、经济的种种原因，历史上北方民族内徙中原者不计其数，小者不论，大者如十六国之匈奴、羯、氐、羌，魏晋南北朝之鲜卑诸族，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色目和清之满族等等，皆因其政权深入中原，而举族或举部移民南下，致使黄河流域在数百年间，成为南北民族冲突的战场，又是多民族杂居交融最活跃的地区。可以说黄河流域是历史上北方民族杂居中原最典型的地方，也是杂居研究的不二选之地。北方民族南迁中原的记载，历史文献中比比皆是。尤其辽、金、元、清王朝，因统治民族就来自北方草原和东北山林，其二元政治、军事制度的兼容并蓄特点，以及契丹、女真、蒙古、色目和满族进入中原后的语言、婚姻、文化等等的变化，都体现了杂居中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特点。关于民族杂居融合问题上世纪就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但夹于元、清之间的明朝却很特殊，虽然明初也接纳了近百万的归附故元官兵和自愿南迁的北方各族的部落首领及其属民，但文献中却是来有影而去无踪，后续记载不清。应该说，明朝多民族杂居中原的状况不逊于前朝。明继元兴，承接的是继辽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多民族杂居中原盛况空前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会因统治

^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 页。

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明朝立国之后，虽然以标榜恢复汉唐制度为己任，但为削弱北元和争取与东北、西北民族的联合，不仅不阻止南下归附的蒙古、女真诸民，甚而积极招徕。因此，北方移民未因汉族的崛起而止步南下，而且移民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丝毫不逊于以往诸朝。“达官”、“达军”、“达兵”“达人”，就是明实录中对北方归附人的称谓。尽管中原民族杂居程度，明朝不逊于元朝，但明代文献中却往往语焉不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或许在明统治者看来，面对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夷入夏而夏之”，或已人居中原者不宜“无故分辨之”^①。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地说，明朝对多民族杂居中原问题，有不同于辽、金、元、清朝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也表明，明朝归附人在文献中的记载具有明代特点。

受史料局限的影响，有关明代内迁民族（归附人）杂居中原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因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夹于辽、金、元、清王朝中唯一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明王朝的特殊性，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关注。国外致力于南迁蒙古、女真研究的当属美国学者亨利·萨路依斯（也译为“赛瑞斯”、“司律思”）。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MCBH, 1956 – 1959）和《永乐时期中国和女真之关系》^② 两部大作中。他的研究揭示了洪武、永乐时期蒙古、女真南迁史实。他的研究表明，明初大量蒙古、女真人以各种途径进入中原，或在衙门供职，或被编入卫所成为军人。他们的安置几乎遍布明朝的每一个省份，尤以北方为多，南方则以南京周围数省最为集中。他认为：明朝历代当政者对这些移民，持之以恒的实施汉化政策，使之最终慢慢消失，“成为了汉人”；只是消失的过程“无法清晰的描述”^③。他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的，只有《明朝初年封爵的

^① (明)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三“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上”，京华出版社，林冠群、周济夫点校本，1999 年版，第 1240 页。

^② 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 – 1968), Bruxelles Juillet, 1959, Bruges, Imprimerie Sainte-Catherine, S. A 和他的 Sino-Jurced During The Yung-lo Period (1404 – 1424), Wies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9.

^③ [美] 塞瑞斯：《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绪论》，于默颖节译，载《蒙古学信息》2002 年第 4 期。

蒙古人》^①、《明朝政府给予蒙古人的封地》^② 和《明朝初年在中国的蒙古风俗残余》^③ 等极少部分，前者是洪武、永乐年间南迁封爵的蒙古人物传记，后两者论述的是给归附蒙古人土地和风俗习惯变化问题。萨路依斯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明实录》、《明史》等正史文献，受官方文献选择性记载的局限，萨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代前期。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明初蒙古、女真南迁史事研究最全面的论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涉及这一问题的有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④，其中第一章“元朝崩溃和明初的蒙古人”专题论述了洪武、永乐时期蒙古人内迁，以及明廷的安置措施及其变化和影响。由于萩原先生的视角在宏观蒙古史方面，故对蒙古归附人的论述有限，史料也未越出《明实录》、《明史》等官方文献范围。明代内迁的北方民族不唯蒙古，还有女真、回回（色目）、高丽、朝鲜等各色非汉民族。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⑤ 和江嶋寿雄《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⑥，是继萨路依斯之后，专题探讨明代女真史及其内迁问题的力作。尤其江嶋之作对女真移居辽东及其明朝安置政策等都有深入细致的考察，书中对辽东安乐州、自在州的研究，初次揭示了明朝对内迁女真人有不同于蒙古人的安置特点。

国内学者涉及这一问题比国外要早，张鸿翔称得上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自 1932 年始，张鸿翔在《辅仁学志》上先后发表的《明外族赐姓考》^⑦、《明外族赐姓续考》^⑧，及其遗稿《明代各民族人士

^① [美] 亨利·萨路依斯：《明朝初年封爵的蒙古人》，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 10 辑，1964 年。

^② [美] 亨利·萨路依斯：《明朝政府给予蒙古人的封地》，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 年第 3 期。

^③ [美] 亨利·赛瑞斯：《明朝初年在中国的蒙古风俗残余》，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 22 辑，1965 年。

^④ [日] 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棚舍出版社，1980 年版。

^⑤ [日] 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同棚舍出版社，1992 年版。

^⑥ [日] 江嶋寿雄：《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江嶋先生米寿记念著作集出版委员会编，中国书店 1999 年版。

^⑦ 《辅仁学志》第三卷第二期，1932 年 7 月出版。

^⑧ 《辅仁学志》第四卷第二期，1934 年 11 月出版。

人仕中原考》^①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其研究用力之深，史料之丰富，迄至今日无出其右者。张鸿翔的研究不同于国外学者，其成果建立在广泛的档案、文集、地方史志及笔记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慧眼识金，以内迁归附人姓名变更这一影响归附人研究深入的关键问题入手，通过对数以百计移民更名资料的整理，犹拨阴除霾，奠定了明代北方民族内迁研究得以深入的基础。

张鸿翔的研究当时并未引起学界内的回应，沉寂半个世纪之后始有呼应。如宝日吉根的《试述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②、王雄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③、蔡志纯的《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④、邸富生的《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⑤、彭勇的《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⑥，以及林松、何葵的《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的部分内容^⑦等，都是近三十年来直接关涉北方民族内迁的研究成果。前两篇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探讨了明初招抚和安置南迁蒙古人的政策内容及其背景和意义；后三篇是九十年代以后，对蒙古等民族移民分布、职业、任用等方面更为细致的考察，涉及到某些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书名虽不涉及明代，但其中“明代西域回回人附中原考”等章节^⑧，却集中研究了西域人人附史事。明初“回回”概念的界定尽管还有讨论的必要，但其研究弥补了西域人人附史事的空白。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在赛路依斯和萩原淳平等成果基础上，推进了对明初归附人安置、分布及其相关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

^①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③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

^④ 《蒙古史研究》第四辑，1993年。

^⑤ 《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⑥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⑦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⑧ 书中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明代西域回回人附中原考”、“关于明代回回的移向问题”、“明代西域人附回人口及分布”、“明代西域人附回回的职业结构”、“明代人附回回姓氏汉化考”。

二十世纪末明代归附人研究，因有了档案等新史料的利用，解决了正史记载不足的问题，推动了宏观视野下的具体考察。早在三十年代，张鸿翔先生就已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其《明外族赐姓续考》、《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所集人物资料，主要采自明代卫所官员的世袭名册——卫所《选簿》。卫所《选簿》中保留了很多内迁人资料，鞠德源《从〈三万卫选簿〉看明朝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经营》^①和李鸿彬《简论三万卫》^②二文，即依《三万卫选簿》的资料讨论三万卫^③职能和作用。由于三万卫正是永乐以来安置内迁女真首领的主要卫所，客观上已触及了内迁女真人问题。日本存有13部明代卫所选簿抄本，利用选簿研究起步很早。川越泰博即以明代卫所选簿中的资料，研究明朝政治和军事制度，成果多有创新。其《明代女直军官考序说——〈三万卫选簿〉分析通》^④、《靖难役建文帝麾下卫所官》、《靖难役燕王麾下卫所官》^⑤、《靖难役后燕王麾下卫所官》^⑥等文，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卫所中内迁蒙古、女真官员信息，其挖掘《选簿》史料价值的贡献与张鸿翔先生一样功不可没^⑦。现今明代卫所研究中，档案、族谱以及明人文集、考古等资料都在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成果日新月异。本书也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先贤研究的成果，又启迪于上述新方法、新史料的思维和研究手段，才不忝愚陋选择这个难题。

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有多年，最初的兴趣是从明代辽东内迁的女真开始，研究方法是从实录入手。但遇到的问题是，实录记载的内迁女真，其后续的踪迹无处可寻；实录虽记载了最初由安乐、自在两州安置管理，但却找不到两州管理内迁女真的具体史料。相

① 《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③ 按：三万卫是明朝辽东都司管下卫所，驻今辽宁开原县老城。

④ 见《史苑》第38卷第1、2号，1977年2月。

⑤ 两文收入氏著《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⑥ 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0年。

⑦ 按：日本保存选簿以及研究情况，可参阅台湾学者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等。

反，两州所在地开原城内的三万卫和辽海卫中却屡有“达官”朝贡的记载。两卫中的达官与两州自愿归附女真有无关系？实录资料提供不出解释的依据。从学者已有成果看：研究卫所的，以达官为卫所成员^①；研究两州的，又以自愿内迁女真的记载为州民资料^②，两不相干，都未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内迁人有来源却无踪迹，导致女真南迁后的问题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带着疑问将《三万卫选簿》中的达官与《明实录》中内迁女真进行比对考订，发现三万卫中的“带俸达官”，与安乐州、自在州内迁女真实为同一群体。由于安置两州的内迁女真人，需在卫所世袭领俸，为此两州女真世系被记载于三万卫和辽海卫选簿中^③。既然两者为同一群体，卫所“达官”的记载，就是永乐之后内迁女真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④。受此启发，举一反三，我们从其他卫所选簿中，陆续获得大量内迁蒙古人以及其他民族归附人资料，遂使鞑靼等族归附人安置卫所后的研究，得以展开^⑤。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选题之所以着眼于军事卫所，是基于明朝将军事卫所作为南迁蒙古、女真人的主要安置处所，归附人主要集中在卫所^⑥的分布特点。诚如前人的研究，明朝安置归附蒙古、女

^① 鞠德源《从〈三万卫选簿〉看明朝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经营》、[日]川越泰博《明代女直军官序说——〈三万卫选簿〉分析通》以及张鸿翔的论著。

^② 见[日]江嶋寿雄《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江嶋先生米寿记念著作集出版委员会编，中国书店1999年版。

^③ 见拙文《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达官考》，载《燕京学报》新二十期，2006年。

^④ 这里指的只是《三万卫选簿》中的“带俸达官”。卫所中除带俸达官外，还有不称“达官”的女真等非汉族官员。他们为何不称“达官”，与“达官”有何不同，本人也有文章辨析，可见《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⑤ 拙文《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与军事卫所建设》（载《民族史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卫所选簿与明实录资料结合，对洪武归附故元官兵安置北方卫所问题的探讨。

^⑥ 按：明朝境内来自北方的非汉族官员，不只洪武及永乐以降的归附人，还有元朝已杂居中原，改朝换代没有随元顺帝北退的蒙古、色目等族官员，他们或改名换姓隐居乡里，或为商贾，或被举荐进入明廷任职，人数也不在少数。因他们的情况与归附人不同，需另作研究，不在本书讨论之中。

真等人，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①，尤以京畿和南直隶最为集中而且人数最多，女真则又以安置于辽东为主。故我们先从京畿和辽东都司入手，通过两地归附人的考察，探究有明一代蒙古、女真移民杂居中原地区的演变情况。从题目看，本书内容也必然涉及明朝军事卫所制度，故而我们也欲初步梳理卫所体制中对达官的组织管理，以期有助于明代军卫制度研究；明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阶段，明朝对内迁民族的政治态度及其政策措施，在中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发展中的客观影响和作用，也是本书关注的要点。

本书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阐释卫所归附人的由来。明初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故先对明朝北方民族南迁作一梳理。有关明初蒙古、女真南下问题研究成果最多，但主要集中在洪武、永乐到宣德时段，实际上土木之变前后，瓦剌在北方进行的统一战争，也造成避难形式的南下浪潮，规模虽不及洪武、永乐时期，但涉及安置政策的变化，故专设一节进行论述。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讨论洪武、永乐时期对归附蒙古、女真的安置及其组织特点，用以揭示南迁蒙古、女真进入卫所的途径及其安置反映的问题。关于故元归附人安置，以民族政策的视角，已有学者做过阐述和研究。但安置并不是简单的民族政策问题，根据选簿资料，它还是北方卫所建设的重要环节。朱元璋是把归附人安置和军事卫所建设合二为一，故而掩盖在安置政策背后，实际上还有以前朝官兵组建明朝军队的问题。对永乐以降归附人的安置，这两章分别剖析了安置女真的安乐州、自在州及其和三万卫的关系，以及锦衣卫和保定、定州诸卫安置蒙古人的组织特点，以提出永乐以来归附蒙古、女真，具有不同于洪武时期归附人的优养身份的观点。这种安置身份的差异，导致后代的发展也有不同的特点。这是以往研究所未提到的重要现象。

^① 邱富生的《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一文认为：明初蒙古人的居住地遍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福建、贵州、云南等14个省、市、自治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第四章，就洪武、永乐时期归附人身份差异，提出“军籍达官”和“寄籍达官”的概念。军籍指洪武时归附充军卫所的蒙古、女真人，“寄籍达官”（也称“带俸达官”）是文献中专指永乐以降归附后安置卫所“带俸”的蒙古、女真人。本书通过达官差异的对比，界定了两种身份达官的特征，并指出造成差别的原因主要在当朝所面临的政治形势需求。本章还进一步梳理军籍和寄籍达官中后期身份逐渐接近的变化，并指出靖难之役和嘉靖军卫改制，对达官身份变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五章，具体通过婚姻和改名两个重要文化现象，透视有明一代达官融入社会的历程，以及同化问题。同化是卫所民族（亦即杂居中原的归附人）关系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因囿于资料不足，也最难把握。这一章利用碑铭、谱牒，结合文集和选簿资料的互证分析，指出达官婚姻和姓名汉化，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变化显现在成化与弘治朝之际；但从外在变化到内在认同的改变，仍有一个过程。明朝归附人安置有相对集中的特点，相对集中客观上也有延缓变化的作用。

结论部分，是对明代多民族并存状况的认识和思考。

应该说，本书只是初步研究成果，之所以还敢见诸读者，只为抛砖引玉。唯愿同仁不吝赐教。